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Japanese *Shin Kunkogaku* (New Philology)

Wang Xiaolin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ical Studies, or Xunguxue (訓詁學), has today been superseded by modern Western fields of learning such as semantics and other branches of linguistics. Yet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modern period, Xunguxue occupied a position of key importance in Chinese academia.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Xunguxue was also introduced to Japan by scholars such as Luo Zhenyu and Wang Guowei, and thi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Japanese academic world. After World War II, Xunguxue in Japan was further developed by a group of Kyoto-based scholars to form a new theory known as Shin Kunkogaku (新訓詁學) or New Xunguxue. This school has hitherto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outside Japan, but its methodology and theory have seen widespread interest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Japanese Shin Kunkogaku, its origins, and its potential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scholarship. It also explores how Shin Kunkogaku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ical Studies or Xunguxue, as well as from the more recent and similarly named Western approach of New Philology. The works of the scholars of Shin Kunkogaku combine the best features of the old and the new methodologies of Philological Studies. In effect, the method allows the text to interpret itself. So far this method has reveal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extual criticism. And therefore, while the ultimate goal of Xunguxue is to restore text as nearly as possible to their original form in the textual meaning and social implication, Shin Kunkogaku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and constraint. In other words, in terms of textual criticism, Shin Kunkogaku is free of discourses of power, such as classic theology or other singular ideology, while combining the spirit of positivism from the old philology with modern western linguistic theor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employs humanistic approach and scientific method to accomplish textu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revivify the facts and recognize the nature. As Western scholars would put it, it is “to secure the autonomy of philology by separating it from theology”, while also “be independent form of knowledge as a critique of authority a rejection of all metaphysical grounding”. By this, we can nowadays use Shin kunkogaku to explore the origin, meanings and nature of texts by exploring their rules, structure and difference, and thus both the widened scope and the depth of humanities could be widened.

Keywords: Chinese Xunguxue; Japanese Shin Kunkogaku; Kyoto School; New Philology

Author: Wang Xiaolin,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Xi'an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in 1984, He earned his MA from Kyoto Prefectural University and PhD from Kyoto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His research concentrates o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s of literature, religion, mythology, and intellectual thought. So far, He has published six academic books in Japan, Taiwa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ll of the books included in monograph series. He also published a number of article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National Studies*; *Studies in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Mythology*; *The Literature of Zen Buddhism: The Ten Oxherding Pictures*; *Studies in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so on.

日本“新訓詁學”及其潛在價值

王小林



[摘要]“訓詁學”在中國學術史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乾嘉樸學不僅在中國得到傳承，還流傳到了日本，通過羅振玉、王國維等對近代的京都學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如此，訓詁考證之學在1940年代的日本還經歷過一次寧靜的革命，並誕生出了“新訓詁學”。它先是在日本學者往來的書信中，經過理性而睿智的討論之後，又被其他京都學派的學者納入研究之中。從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他們的方法與舊訓詁學“用今天的語言解釋過去的語言”不同，而是從語義學角度出發，將每一個概念置於語義的“場”（field）中來考察。由於在文本

中每一個概念都被組成其“場”並被其他詞語所包圍，因此，詞語的意義必須通過與之相關聯的詞語之間的關係來把握。事實上，這種方法就是讓文本本身來解釋其本身的意義。這種方法在對其他文獻的應用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效果。如果說傳統訓詁學的終極目標是在表層和制度的層面確認文字意義，那麼，“新訓詁學”則是對這種限制和束縛的徹底突破。它擺脫了籠罩於文本解讀周圍的傳統神學乃至單一的意識形態的權力氛圍，將傳統訓詁學“實事求是”的方法與近代西方語言學理論相結合，以文本為中心，運用一切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最新方法對文本進行分析和詮釋，最終還原事實，認識本質。借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表述，就是在“確保其從神學中分離後的、作為哲學的主體性”的同時，“拒絕所有形而上學的背景，建立擁有批判權利的獨立的知識體系”。由此看來，今天人們所從事的訓詁之學，都可以嘗試運用“新訓詁學”的方法，透過文本呈現的規律、結構、差異，來探究文本的原始形態、意義和本質。這樣，既可以增強人文學研究的深度，也能夠拓寬人文學研究的廣度。

[關鍵詞]訓詁學 日本新訓詁學 京都學派 新語文學

[作者簡介]王小林，1984年畢業於西安外國語學院日語系，1994年獲京都府立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99年獲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亞洲及國際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日本古典文學、中日比較文學、中日比較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日本古代文獻漢籍受容的研究》、《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日中比較神話學》、《走入十牛圖》、《日中比較思想序論——名與言》等。

“訓詁學”原本是中國古代一門綜合性的應用型學科，尤其是清代的乾嘉樸學，曾經在中國學術史上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但時過境遷，與時下流行的各種顯學相比，它的風光不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與中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訓詁學”流傳到日本後，不僅對後來的京都學派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1940年代之後，還經歷過一次寧靜的革命，誕生出了“新訓詁學”。所謂“新訓詁學”，並不完全等同於近年來由歐洲學者所提出的“新語文學”（New Philology）概念。^①“新訓詁學”先是出現在日本學者往來的書信中，之後經過理性而睿智的討論，被其他京都學派的學者逐漸納入研究之中，發展為一個新的方法。其特徵可以概括為，從文本的表達及內部結構入手，對其文字語義、文本意義乃至哲學思想本質作全面考證。鑒於“新訓詁學”尚未被日本以外的學者所瞭解，本文擬就其來源、方法、特徵及潛在價值做一評述。

一 “新訓詁學”的起源

“新訓詁學”的思想，誕生於1940年代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よしかわこうじろう，1904—1980）與學者大山定一（おおやまていいち，1904—1974）之間的往來書簡中。這本祇有一百五十多頁的小冊子《洛中書問》，記錄了吉川有關“新訓詁學”的思考。其中寫道：

字典的解釋，要而言之，不過是一個近似值、標準答案。而語言本身，常常並不停留在某一點上。在實際使用語言文字的時候，根據使用者和使用狀況的具體實際，會產生出千差萬別、各不相同的結果來。雖然詞義以字典的標準解釋為基礎，是立足其上的，但也會在字典的基礎解釋上遊移不定。這種遊移不定，究竟“遊”向何方？定在何處？對其進行測定，就是文學研究之道。要想使測定成為可能，必須洞察語言使用者即發言者的心理。換言之，文學研究，必須是以語言為資料的人的學問，這也是文學研究的正道。在這一點上，文學研究與語言學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語言學研究所追求的，是作為詞典意義所表示的、統一意義的方向。形成這種意義的因素是社會，所以，它與社會學乃至民族心理學相互關聯。而文學研究，雖然以語言研究為基礎，但對象是個人的語言，確切地說是通過個人的語言追溯個人的精神，追求的是意義分裂的方向。^②

吉川對“訓詁學”有如此見解，與其兩位導師的影響有直接關聯。一位是日本著名漢學家、“京都學派”的創始人狩野直喜（かのなおき，1868—1947）教授；1923年，吉川考取京都帝國大學後，選修中國文學，遂拜其為師；而狩野直喜的治學方法，又是清王朝被推翻後避居日本的王國維（1877—1927）所傳授。另一位是中國的楊鍾義（1854—1940）教授——1928年，吉川到北京大學留學，拜精通考據學的楊鍾義為師，專攻音韻學。

吉川對“舊訓詁學”與“新訓詁學”之區別的思考，被後來的日本文學研究家、原京都大學教授佐竹昭廣（さたけあきひろ，1927—2008）所傳承，並作了更加詳細的詮釋。佐竹在《訓詁之學》一文中指出，舊訓詁學是“用今天的語言解釋過去的語言”，“過去與今天無論在語言和文字上，都經歷了無數的變遷。將過去的語言正確解釋為今天的意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以今天通行的字義閱讀古書，就背離了訓詁的方法，無法把握古書的含義。訓詁學的必要性亦即在此”。^③然而，“新訓詁學”則完全不同：

文學作品，祇有語言性被客觀化之後，纔可以稱為文學作品。表達主體將怎樣的思想、在何種狀況下、用什麼語言來表達出來，如果不對這些要素進行綜合性的追溯體驗，不對語言表達出來的作品內部世界進行明確的檢驗，我們對作品和作家究竟能夠瞭解多少呢？文學研究，歸根結底，必須通過語言瞭解作品的“意義”，進而通過瞭解作品的“意義”來解讀作者思想的“意義”。這就是文學研究的本質。^④

①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World Philolog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② [日]吉川幸次郎、大山定一：《洛中書問》（大阪：秋田屋，1946），第8—10頁。

③④ [日]佐竹昭廣：《萬葉集拔書》（東京：岩波書店，1980），第203、204頁。

佐竹昭廣所強調的對“意義”的追求，是“新訓詁學”之所以為“新”的主要特徵。

重審“新訓詁學”的方法，可以看到，與“舊訓詁學”對語言文字的表層意義、社會性、社會學意義探索的方法不同，“新訓詁學”則是從語言文字的深層、潛意識、心理結構的角度認識並追求其“意義”的。

二 “新訓詁學”的方法

（一）在問題中發現規律

“新訓詁學”秉承乾嘉樸學“實事求是”的態度，針對具體問題，從文本出發，在問題中發現規律以及解決問題的線索。例如，主要用漢字的表音功能編寫的日本古詩集《萬葉集》一直存在許多不確定的讀法，原因多在於漢字書寫與日文古詩音節的不符。近代以後，隨着科學主義在人文領域的影響，絕對尊重原文的教條主義，特別是對大正年間編纂的《校本萬葉集》喪失了批判精神，成為研究者的一大障礙和弊端。佐竹在討論《萬葉集》的文字訓詁問題時，批判性地繼承江戶時代國學家本居宣長（もとおりのりなが，1730—1801）提出的“字餘說”，對《萬葉集》的文本提出了一系列修訂設想。

所謂“字餘說”，是以《萬葉集》詩歌的“音數律”為參照，對違反“音數律”的個案進行考察的方法。日本古代詩歌，無論長歌還是短歌，均由5、7的音數構成。本居宣長在《字音假字用格》中指出，《萬葉集》中的部分詩歌的書寫方式並不符合這種音數。他通過考察和歸納發現，凡是“音數律”存在問題的詩歌，特別是音節超出“音數律”者，均包含了可無聲化的母音“あ=a”、“い=i”、“う=u”、“お=o”。然而，這一發現在本居宣長之後的研究中並未受到重視。直到1940年代以後，佐竹在對《萬葉集》的音數律重新做了考察後，纔有了進一步發展。佐竹發現，凡是不符合“音律數”的詩歌，其文字表達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具體表現在，或者前後文銜接不當，或者用字有誤。佐竹因此提出了“合理性脫字誤字說”，對不符合“音數律”或者“音數律”正常但漢字表達不一致的和歌進行考察，《萬葉集》中近四十首詩歌的讀法和寫法因此得以訂正，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也因此得到解決。

上述方法對《萬葉集》的文本修訂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裏試舉四例：

例一，奧楸常念者（卷三，474）おくつきとおもへば→奧楸常今者 おくつきといま

例二，壽母不有惜（卷四，785）としもおしからず→身母不有惜 みもおしからず

例三，後波落易（卷六，988）のちはちりやすく→後波落邊 のちはちりすぐ

例四，許能久礼罷（卷十九，4166）このくれやみ→許能久礼能 このくれの

在四例中，箭頭左邊為《萬葉集》原文及訓讀句，箭頭右邊為修訂後的原文和修訂句。通過對各種手抄本文字的比較，以及訓讀句內容的重新考證，特別是依據“音數律”的規律，佐竹推測，在《萬葉集》的抄寫過程中，“念”、“壽”、“易”、“罷”極有可能是“今”、“身”、“邊”、“能”的誤寫。而以“今”“身”“邊”“能”的訓讀重新讀這四首和歌，不僅“音數律”完全符合本居宣長所發現的規律，同時意義也較之前的各種解釋更加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佐竹並沒有忘記針對這些詩歌作為文學作品的“意義”——其表達主體的思想、歷史背景以及語言風格的追求。例如，在將例三“落易”修訂為“落邊”的基礎上，佐竹又關注到《萬葉集》中由“落邊=ちりすぐ”所顯示的思想傾向，撰寫《自然觀的祖型》一文，在歸納和分析類似表達的同時，通過與佛教、基督教的自然觀的比較，對古代日本人的自然觀做了闡述。^①

佐竹之所以能夠在《校本萬葉集》中有突破和創新，與他運用近代語言學等新理論，從結構主義、語義學、人類學等角度將《萬葉集》研究相對化的方法有極大的關係。換言之，佐竹的研究雖然主要以《萬葉集》的文字訓詁為中心，但涉及的範圍卻涵蓋了版本校勘、文字訓詁、比較思想、

① [日]佐竹昭廣：《萬葉集再讀》（東京：平凡社，2003），第41—64頁。

語言哲學、民俗學、心理學各個領域。新近出版的《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對佐竹昭廣的《萬葉集拔書》做了如下評價：

作者在書中對《萬葉集》語言意義的探討，從方法論上講是基於結構主義語言理論的，作者的目的是闡明詞彙的結構及其歷史的變化，並通過逐字逐句的縝密和徹底的文獻考證來進行實證的解讀。但又不止如此，作者通過後世日語發展的廣闊空間，打破了《萬葉集》研究在文獻上所受的限制。古代文獻史料和文學作品自不必說，作者還自如地引用了中世的傳說、物語草子、能劇、狂言、近世的笑話、淨琉璃、歌舞伎、落語、民俗詞彙以及近現代小說中的語言，來對語言意義進行探究。^①

其實，如果仔細閱讀《萬葉集拔書》，讀者不僅會被著者寬闊的學術視野、嚴密的論證邏輯、典雅的文字表達所折服，同時還會發現，每一篇論文，都是在解決文字語言最基本的問題，而非某種理論的簡單演繹。那些在研究史上或被輕視或被無視的文字語言問題，經由作者的考證，往往從根本上顛覆或改變了形成已久的共識和定論。在所有的文章中，舶來的理論和傳統的方法，都變為作者手中可用可棄的工具，眼前的具體事例，永遠優先於那些現成的工具。而經由作者對具體事例的質疑、剖析，一個又一個的成見被推翻，隱藏在語言文字背後的歷史事實和思想形態頓然間變得鮮活生動、觸手可及。

（二）在規律中發現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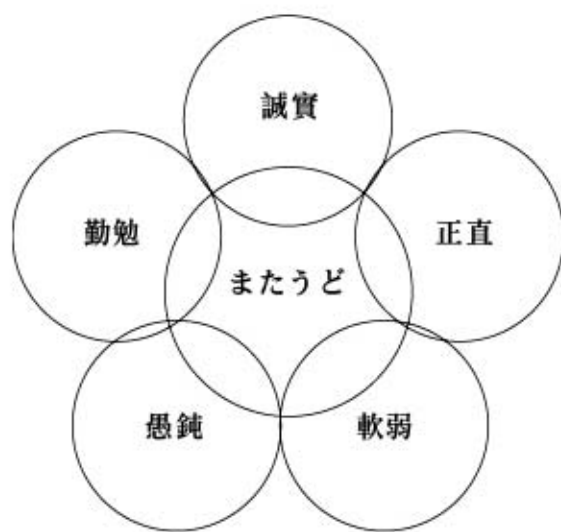
佐竹昭廣運用“新訓詁學”，除了呈現在《萬葉集》的研究成果之外，還以另一種形式體現在中世紀日本的民間傳說研究方面。

例如，1973年出版的《民間傳說的思鄉》所運用的資料，基本上是從日本全國各地收集來的民間傳說。不僅數量龐大，而且語言表達也因地理因素呈現出極大的差異。然而，面對各種看似漫無邊際且非傳世的資料（其中包含大量的圖畫），佐竹以狂言中的角色“又九郎左衛門”為線索，注意到狂言和民間傳說中反覆出現的關鍵詞——“正人”、“全人”、“完人”、“直人”。鑒於這些用詞的日文訓讀均為“またうど”，佐竹首先運用古代的詞典以及其他文獻中所見“またし”、“またい”等詞彙，考察這一概念的起源，同時對民間傳說中出現的相關概念進行歸納和分析，將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以及意義結構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不止如此，佐竹同時還對“またうど”的反義詞“かだむ”（慳貪、懈怠）進行了詳細考察，最終就中世紀日本社會圍繞“善”與“惡”的道德律內涵提出了獨特而又可靠的詮釋。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佐竹對於“またうど”這一概念的意義分析，並不是以某一個單一的定義來確定的。相反，雖然“またうど”中包含了“正直”的意思，但“またうど”與“正直”並非同義詞的關係。“正直”祇不過是“またうど”的意義構成要素之一。有時以“誠實”的面目出現，有時又顯得“軟弱可欺”，有時甚至顯出“遲鈍”、“笨拙”以及“愚蠢”的特徵。有時又會是上述所有概念結合在一起時所表達的人性之善的概念，例如“勤勉”（像傻瓜一樣的遲鈍、笨拙，但是卻一心一意勞作不息）。

換言之，從與“またうど”相關的各種文獻內容來看，“またうど”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意義構成體（見圖1）。

圖1 “またうど”的意義結構



① 東亞出版人會議編：《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第276—278頁。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またうど”這一概念是難以用單一概念規定其性質的獨特的意義組合，纔向人們展示了中世紀日本人的倫理意識結構。這種結構表明，如果嘗試對中世紀日本人的意識結構有所認識的話，是不能站在本身的文化語境中，用自己的語言有關“善”與“惡”的概念來作為尺度的。所以，哪怕是對待一個貌似普通的概念，人們也應該運用所有相關文獻對其意義結構進行全方位的考察之後，從意義的關聯而非某個固定的角度進行瞭解。這一點，也正是“新訓詁學”在人文研究方面具有的另一個重要意義。

（三）在結構中發現差異

“新訓詁學”的方法，乍一看與索緒爾（F. d. Saussure, 1857—1913）的結構主義理論密切相關。然而，它並非是對結構主義理論的簡單套用。現代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理論始終停留在對語言表層的關注，祇關心語言意義社會制度側面的結構性分析，而“新訓詁學”研究方法則是在不斷汲取近代學術方法論的同時，對文本語言深層結構的關注。這一點，可以從對佐竹研究影響甚深的宗教學研究者井筒俊彥（いづつとしひこ，1914—1993）的著作中體現出來。

井筒俊彥以研究伊斯蘭哲學著稱。他的英文代表作“*Ethico-Religious Concepts in the Quran*”（日譯本《意味の構造》，中譯本《意義的結構》），是一部研究伊斯蘭哲學的經典。這部著作所採用的方法，不是對伊斯蘭哲學的歷史性敘述，也不是將伊斯蘭哲學與其他哲學進行比較，而是以伊斯蘭文獻中反復出現的關鍵詞“Kufr”、“Iman”、“Kafir”、“Sidq”為線索，通過對這些概念的內部結構、相互關聯的考察，就伊斯蘭哲學的認識論、倫理觀做了詳實而又縝密的闡述。美國研究伊斯蘭哲學的著名學者亞當斯（Charles J. Adams）曾就井筒的研究方法做過如下評論：

他從語義學的角度，將每一個宗教倫理的概念置於語義的“場”（field）中來考察。在文本中，每一個概念都被組成其“場”並被其他詞語所包圍。因而他強調，詞語的意義必須通過與之相關聯的詞語之間的關係來把握。事實上，這種方法是讓《古蘭經》來解釋其本身的意義。他的方法在該書的第一部分表現得最為充分。重要的是，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應用在《古蘭經》的研究上，也可以應用在對其他文獻的闡釋上。^①

“讓《古蘭經》來解釋其本身的意義”，實際上就是為了避免在先入為主的驅使下，將某種理論生搬硬套在具體文本之上。這一態度，也是“在文本中發現規律”的態度。在井筒看來，文本的研究，就是將文本看作一個獨立的有機體，透過語言的表面發現其內部結構；通過結構，窺視其內在的“語言”。這種內在的“語言”，纔是文本的真實意義所在。

井筒俊彥在晚年與佐竹昭廣有過密切的交流。他曾經受邀為1990年由中央公論社出版的《民間傳說的思想》撰寫“導讀”。在“導讀”中，他首先運用大量篇幅就其“語義學”（Semantic）理論進行闡述，其中寫道：

在現代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理論中，至今依然保持着壓倒性支配力量的《講義》時代的索緒爾，對於意義現象的研究始終局限於語言表層的關注，以及對語言意義社會制度側面的結構性分析。而我則更願意從代表東方語言論的唯識學傳統角度，不僅僅局限於對語言表層的社會制度的固定性的研究，同時在潛意識或無意識深層的流動性生成的不穩定性中把握其真相。對於語言和意義本身的這兩種不同的態度，也必然決定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論的結論。^②

文中所指出的“在潛意識或無意識深層的流動性生成的不穩定性中把握其真相”的方法，與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有着明顯的不同。至於兩者之間的具體區別，井筒在其《意識與本質》一書中有着詳細論述。概括起來就是：所有語言的表達，都經過了從無意識、潛意識到表層的過程；而語言的最終表達形式，應該是潛意識（阿賴耶識）中無數“語言種子”在相互碰撞、抵抗、鬥爭之後的產物；因而，以這些語言表達形式為線索探索其產生過程，就是對形成其結構的生成意識的

① Toshihiko Izutsu, *Ethico-Religious Concepts in the Qur'an*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② [日]佐竹昭廣：《民間傳說的思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第250頁。

把握和瞭解；在這些關係中發現的差異性，就應該是這個語言的意義。就此，井筒又做了如下論述：

用索緒爾理論來形容的話，存在論中的“意義”其實就是指“差異化”或差異性的原理。站在較為東方哲學化的傳統的立場，我姑且將其稱為“分別”或“分節”。各色各樣的事物現象通過自身所擁有的界限從其他事物那裏獲得獨立性。例如，當某個符號象徵A的時候，A會區別於B、C、D、E等其他事物而獨立。A亦因此而作為A開始發揮其獨立性。換言之，A通過意義的“分節”，第一次作為存在者A現象性地展示自己。事物現象，即我們本身通常所感受到的存在者和存在世界，事實上不過是一個個“意義分節形態”，以及由無數個“意義分節形態”組成的龐大的有機系統而已。如果沒有意義的差異化和識別性，由各種不同事物現象構成的眼前的世界就不可能存在。這樣的事實，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基礎命題定義為“意義分節即存在分節”。^①

由此可以窺測到，井筒的理論方法，某種程度上是將傳統東方的認識論（特別是唯識哲學中的“阿賴耶識”）與西方（特別是柏格森存在論哲學中的“純粹異質性”）相結合的產物。

（四）在差異中發現本質

與其他科學相同，“訓詁學”的終極目標是透過語言研究認識和瞭解事物的本質。然而，如果透過文本看到的只是“意義”之間的“差異”，那麼“本質”又該如何來認識和確定呢？對此，井筒認為，通過結構來認識語言的差異性，就是對事物本質的認識。他在其代表作《意識與本質》一書中說道：

所有的“本質”並非完全以整齊完備的形態存在於文化性的無意識的“語言阿賴耶識”中。正如無意識以及阿賴耶識所暗示的，當我們深入到這樣的意識狀態來探索“本質”時，所有的一切均會隱蔽於潛在形態特有的模糊世界裏。不僅如此，在這個世界裏，那些尚未作為“本質”而確定的，或者說尚未結晶的無數個浮動的意義因素，只是在那裏呈現出忽而結合忽而分離的狀態。在充滿了糾紛的無意識的世界裏，形成了唯識哲學所謂存在的“種子”。這些“種子”會隨機脫離潛在的狀態而出現在意識的表層。也就是在這裏，創造出本質並將經驗性的事物分節化。^②

井筒的上述表述，與17世紀法國思想家拉羅什福科（F. D. L. Rochefoucauld, 1613—1680）在《箴言集》中有關認識論的敘述極為相似：“為了瞭解事物的本質，我們必須弄清楚事物的原委。然而，事物的原委幾乎是無窮無盡的。所以，我們的知識永遠停留在事物的表象，永遠只是一知半解。”這裏的“無窮無盡”，可以理解為語言文字的結構背後隱藏的“無窮無盡”的關聯性和差異性。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人們纔可以看到，在“新訓詁學”中，結構主義語言理論能夠與傳統訓詁學以及其他人文學理論相互交融並被發揮得淋漓盡致。作為讀者，也就可以理解“新訓詁學派”何以面對一個文字一行詩句時傾盡所有精力的理由了。

井筒俊彥在《民間傳說的思想》的“導讀”中，對該著作運用“新訓詁學”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做了如下論述：

“またうど”的意義領域，不僅包含了積極的、肯定性的結構要素，同時，針對“またうど”的否定性、破壞性因素，即阻止和妨礙其意義領域形成的要素（例如，正直者的反面意思：吝嗇、不懷好意、貪婪、邪惡等）以自我否定的形式（不貪吝、心懷善意等等），從完全相反的方向來參與“またうど”的意義領域。由於這種否定性要素的參與，“またうど”被意外地增添了新的層面，進一步擴大了其意義領域。阻止意義領域的否定性要素，通過自我否定而作為構成意義領域的一部分發揮機能。這個事實，向人們展示了潛伏於心理活

① [日]佐竹昭廣：《民間傳說的思想》，第264頁。

② [日]井筒俊彥：《意識與本質》（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第109頁。

動深層的根源性悖論，或者說自我矛盾性。^①

這裏就“またうど”意義領域形成背後的“根源性悖論”的闡述，讓人們領略到“新訓詁學”作為人文研究理論所擁有的哲學基礎。

井筒的表述，也可以看作是“新訓詁學”最不同於傳統訓詁學的部分：在文本內部發現規律，從文字表達的關係中發現結構乃至差異，繼而探索其意義，最終通過與相關意義領域的比較，認識其本質。擺脫籠罩於文本解讀周圍的傳統神學乃至單一的意識形態的權力氛圍，將傳統訓詁學“實事求是”的方法與近代西方語言學理論相結合，以文本為中心，運用一切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最新方法對文本進行分析和詮釋，最終還原事實，認識本質。這也可以看作“新訓詁學”最重要的特徵。

“新訓詁學”在日本古典學者的研究中也有出色的運用和發展，這以京都大學教授大谷雅夫（おおたにまさお）的一系列研究為代表^②。為了避免與其他文章重複，在此省略。

三 “新訓詁學”在人文科學研究中的潛在價值

“新訓詁學”對於當今的人文科學研究，包含了許多潛在的意義和啓示。這裏，試以思想史上的“名”與“言”問題作簡單試驗。

日本漢學家森三樹三郎（もりみきさぶろう，1909—1986）曾經比較過中日關於“名”的差異，並從倫理思想的角度對兩者進行分析；特別是他以“名”為綫索對中國倫理思想進行探索的方法，為研究中國文化的特質提供了一個非常新穎而富於啓示的視角。^③雖然森三樹三郎的討論始終集中在中日倫理思想的比較方面，然而，“名”作為中日之間所擁有的一個共通的概念，在彼此的語言哲學史乃至思想史上卻也演繹出了全然不同的兩種形態，並直接影響到兩國的倫理思想、自然觀、政治文化乃至對待外來文化所採取的態度。因此，這裏根據先秦兩漢各家的論述，試就“名”的形成背景與其他各項內容的關係做以下排列：

㉑ 天地=大理=道=真



㉒ 黃帝=聖人=明君



㉓ 名=㉔1 網=符=紀=章=型=㉔2 形=萬物=事=㉔3 善惡



㉕ 人

㉑的內容顯示，“名”的形成背景與古代中國的宗教信仰有着很深的關係。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名”的神秘性。同樣，作為“名”的具體制定者，㉒“黃帝”、“聖人”、“明君”決定了“名”的正統性。這樣，以㉑㉒為背景而產生的“名”，就自然地成為規範宇宙與人間社會的㉓“網=符=紀=章=型”。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㉑㉒㉔㉔1四項與㉔2㉔3之關係。在各家的論述中，“名”不僅是規範宇宙與人間社會秩序的“網=符=紀=章=型”，同時又可以與㉔2㉔3所代表的“形=萬物=事=善惡”等量齊觀。這一點，顯示出中國古代宗教信仰㉑㉒、政治倫理㉔1與現實事物㉔2以及道德倫理㉔3互為一體的基本特點。而作為社會最根本的組成部分的㉕“人”必須通過對㉓“名”的正確把握和運用，纔能夠獲得穩定的㉔1政治秩序和對事物㉔2及其倫理㉔3的正確認識。而隨着“名分論”的產生，㉕“人”的存在及行爲也逐漸被“名”規範和制約。㉓“名”似乎成了通往秩序、權威、

① [日]井筒俊彥：《民間傳說的思想》，第270—271頁。

② 王小林：“永夜清宵何所為——讀大谷雅夫著《歌與詩：和漢比較文學論考》”，《書城》11（2012）：61—70。

③ [日]森三樹三郎：《“名”與“恥”的文化》（東京：講談社，2005）。

事物本身的必由之路。換言之，在中國古代的認識論乃至政治文化中，“名”不僅是認識和把握事物的不二法門，同時也是運行政治、實現個人宗教性終極拯救的唯一途徑。相反，脫離了“名”，則意味着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倫理等各個方面徹底喪失存在的正當性。在對早期中國文獻中所見“名”的意義和結構做了如上分析基礎之後，就可以從倫理學、自然觀、中日近代化發展特徵的角度，討論和分析“名”在這些領域中所發揮的作用了。^①雖然這種嘗試尚有許多不盡完善之處，但可以看到，運用“新訓詁學”的方法探討具體事例，與那種將某種理論直接套用在文本上，動輒借題發揮、離題萬里的所謂研究相比較，這種尊重文本的語境以及關聯性，讓文本自身道來的方法是一種相對可靠的研究方法。

綜上所述，如果說傳統訓詁學的終極目標是在表層和制度的層面確認文字意義，那麼，“新訓詁學”則是對這種限制和束縛的徹底突破。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波洛克（Sheldon Pollock）評價18世紀德國詮釋學的先驅沃爾夫（F. A. Wolf, 1759—1824）的話來說，就是在“確保其從神學中分離後的、作為哲學的主體性”的同時，“拒絕所有形而上學的背景，建立擁有批判權利的獨立知識體系”^②。由此來看，今天人們所從事的訓詁之學，無論是疑難文字的考證，還是錯簡缺文的還原，都可以嘗試運用“新訓詁學”的方法，透過文本呈現的規律、結構、差異，來探究文本的原始形態、意義和本質。這樣，既可以增強人文學研究的深度，也能夠拓寬人文學研究的廣度。作為因應時代發展需要而產生的新的學術方法和思想，“新訓詁學”能夠讓文字訓詁之學永遠不失其魅力，成為步入學術殿堂切實可靠的路徑。

① 王小林：《日中比較思想序論——“名”與“言”》（東京：汲古書院，2016）。

②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World Philology*, 7.